



高校社科文库
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

教育部高等学校
社会发展研究中心

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
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
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
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



诗赋取士背景下的 诗国风貌

杨春俏/著

A Survey of Poetry Kingdom in the Context of
the System of Selecting Talents by Poetry and F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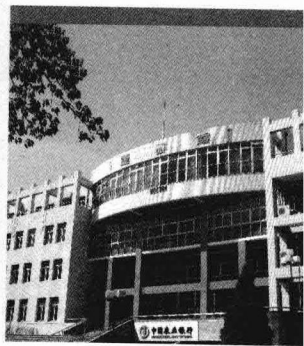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高校社科文库
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

教育部高等学校
社会发展研究中心

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
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
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
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



诗赋取士背景下的 诗国风貌

杨春俏/著

A Survey of Poetry Kingdom in the Context of
the System of Selecting Talents by Poetry and Fu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赋取士背景下的诗国风貌/杨春俏著. —北京:光明
日报出版社, 2009. 9

(高校社科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112 - 0373 - 1

I. 诗… II. 杨… III. 诗歌—文学研究—中国 IV.
I207. 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67862 号

诗赋取士背景下的诗国风貌

作 者: 杨春俏 著

出 版 人: 朱 庆

封面设计: 马忠炜

责任编辑: 祝 菲

责任校对: 徐为正 师英杰 王灵芝

特约编辑: 李 喆

责任印制: 胡 骑 宋云鹏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 - 67078251(咨询), 67078945(发行), 67078235(邮购)

传 真: 010 - 67078227, 67078233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 - mail: gmcbs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

印 刷: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装 订: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开本: 690 × 975 毫米 1/16

字数: 225 千字

印张: 11. 75

版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5112 - 0373 - 1

定价: 27. 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CONTENTS 目 录

绪 论 “诗艺”重于“诗意”的泱泱诗国 / 1

上 编 诗赋取士制度考

第一章 诗赋取士制度的历史沿革 / 8

第一节 隋唐时期：从“以诗逞才”到“以诗选才” / 8

一、隋代“选官试赋”：诗赋取士制度之滥觞 / 8

二、刘思立建言“进士试杂文”考辨 / 12

三、对诗赋在唐代科场中地位日益尊崇过程的分析 / 23

第二节 北宋和南宋：诗赋取士制度的激变与因循 / 38

一、熙宁变法前诗赋取士制度的沿革 / 38

二、北宋中晚期的诗赋、经义之争 / 49

第三节 清代：试帖诗最后的辉煌 / 58

一、乾隆二十二年：试律诗的回归 / 59

二、乾隆帝个人素质对诗歌成为考试内容的影响 / 61

三、乾隆二十二年之前各类考试中诗赋的踪影 / 62

四、加试唐律制度的逐步推行与完善 / 65



第二章 应试诗：诗为“过桥术”	/ 69
第一节 应试诗辨名	/ 69
一、省试诗与省题诗	/ 69
二、程式诗	/ 71
三、试律（诗）	/ 72
四、试帖（诗）	/ 73
第二节 应试诗的命题	/ 75
一、应试诗命题的基本要求	/ 75
二、清代会试所用试帖诗命题分析	/ 77
第三节 应试诗的限韵	/ 87
一、唐代应试诗用韵分析	/ 88
二、清代应试诗限韵分析	/ 92
三、应试诗限韵的操作及影响	/ 102

下 编 古典诗歌创作论

第一章 官方化的诗韵系韵书	/ 108
第一节 从永明文学传统看《切韵》编纂目的	/ 109



一、关于“欲赏知音，即须轻重有异”	/ 109
二、关于“颜外史、萧国子多所决定”	/ 111
第二节 《礼部韵略》：宋代科举的考试大纲	/ 115
一、《雍熙广韵》与《雍熙韵略》	/ 116
二、《大宋重修广韵》与《景德韵略》	/ 117
三、《集韵》与《景祐韵略》	/ 119
四、北宋官修韵书造成的韵书职能分化	/ 122
第三节 神秘的“平水韵”：金代官韵	/ 124
一、刘渊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》	/ 124
二、王文郁《平水新刊韵略》	/ 125
第四节 《佩文韵府》：最后一部官韵	/ 132
一、《佩文韵府》的成书与编撰体例	/ 132
二、《佩文韵府》所体现的韵书职能的转变	/ 133
第二章 针对科场的诗艺训练	/ 134
第一节 试帖诗辨体：惟在颂扬，宜占身分	/ 136
一、有褒无贬，有颂无刺	/ 136



二、占身分之法	/ 138
第二节 试帖诗审题：其义主于诂题，其体主于用法	/ 140
一、审题贵精	/ 141
二、作诗必此诗：字字打碎点出	/ 142
三、试帖诗论题的若干技法	/ 146
四、颜色、数目、方向等字需运巧思	/ 148
第三章 和韵的盛行	/ 151
第一节 和韵的发展历史及概念演变	/ 151
第二节 和韵原因及心理分析	/ 157
一、外部原因：创作环境—诗歌功能	/ 158
二、内部原因：思维方式—诗歌传统	/ 162
主要参考文献	/ 170
后 记	/ 176



绪 论

“诗艺”重于“诗意”的泱泱诗国

诗歌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。自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的《诗经》时代起，诗歌这种形式就成为先民最主要的抒情方式。汉魏时期，五言诗取代四言诗，七言诗亦逐渐雅化。在文学自觉化的进程中，由于社会上层对纯文学的刻意追求，以及宫廷文学创作氛围的影响，再加上汉字与汉语客观上所固有的特殊性，中国古典诗歌（尤其是律诗）在初唐时期最终发展成一种极度精致、精美的语言艺术，并作为一种艺术范型稳定下来，不断被后世作家模拟蹈袭。词、曲等继起的韵文形式虽亦堪为一代文学特色的标识，却始终无法取代诗歌的正统地位；直至清末，文人诗仍然以其高雅品味，居于抒情文学与传统审美意识的主流。

中国历来被誉为诗歌的国度。从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那些大多没有留下姓名的诗人，到目前仍遵循旧体格律进行诗歌创作的人，漫漫岁月长河中，究竟曾浮沉过多少位诗人，究竟曾诞生过多少首诗歌，几乎不可能作出确切统计，历代诗歌总集、选本、别集亦是汗牛充栋。逯钦立先生纂辑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，“摭上古迄隋末的歌诗谣谚”，“网罗放佚”、“删汰繁芜”，总成“一百三十五卷诗歌，完什残篇总计不下百万余言”^①，至于散佚的作品就更不知道有多少了。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期，创作诗人多，创作数量大，作品质量高。清代康熙年间所编《全唐诗》900卷，收唐代300年间2000多位诗人的作品48000余首，也还未能反映唐代诗歌创作的全貌。傅璇琮先生领衔主编的《全宋诗》，成书72册，凡3785卷，收9000余人的诗作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编的《全元诗》，收4000多位诗人的大约12万首诗。正在由复旦大学等联合编纂的《全明诗》，预计总册数在200册以上，总字数将超过1亿。近人徐世昌辑《清诗汇》，收清代诗人6100余家，

^① 逯钦立：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3年，第1页，第2791页。



得诗 27000 余首，正在筹备阶段的《全清诗》编纂组通过初步测算，认为清代诗人总数约为 10 万家，成书则当在 1000 册以上。除了中国，没有哪个国度曾经拥有数量如此庞大的诗人群体；除了汉语，没有哪种语言曾经历久不衰地凝结出体制如此精致稳定的诗篇。

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源远流长。“赓歌纪于《虞书》，六义详于古序，孔孟论言，别伸远旨；春秋赋答，都属断章。三代尚矣，汉魏而降，作者渐夥，遂成一家之言。”^①自梁代钟嵘创作堪称诗话史上“成书之初祖”的《诗品》之后^②，历代诗歌创作者与研究者不断进行诗歌理论方面的探索与总结，诗话专著、诗集评点以及谈论诗艺的片语只言浩如烟海，蔚为大观。宋人已致力于诗话纂辑，著名者有阮阅的《诗话总龟》、胡仔的《苕溪渔隐丛话》、魏庆之的《诗人玉屑》等。近年来由吴文治教授主编的《中国历代诗话全编》，其中已出版的《宋诗话全编》收录诗话 562 家，《辽金元诗话全编》收录诗话 420 家（辽诗话 21 家、金诗话 154 家、元诗话 245 家），《明诗话全编》收录诗话 722 家（含原已单独成书的明代诗话 120 余种）。至于清代诗话，丁福保《清诗话》收录 43 种，郭绍虞踵之而为《清诗话续编》，收录 34 种。这些诗话、诗论寻绎中国古典诗歌历史发展的轨迹，探求诗学流派兴衰演变的规律，形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论范畴，建构了诗学批评的范式与体系，呈现着各家各派的诗学观点与主张，倡导着诗歌的审美趣味与风尚，规范着诗格与作诗的法度。

“诗言志”（《尚书·尧典》）、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”（《毛诗序》），这是中国古人对诗歌本质的定位，他们认为诗是一种借以表达情志的手段；“诗是一种语词凝炼、结构跳跃、富有节奏和韵律、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文学体裁”^③，这是现代文学理论对诗的界定，在强调文学反映生活这一理论前提的基础上，突出了诗歌的体裁特征。

律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最为精粹的代表，在唐代前期基本定型；此后的千余年间，在平仄、对仗、押韵等基本形式特征方面几乎一成不变。在此期

① [清] 何文焕：《历代诗话》（上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 1981 年，第 3 页。

② [清] 章学诚著，仓修良编注：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内篇卷五“诗话”：“《诗品》之于论诗，视《文心雕龙》之于论文，皆专门名家，勒为成书之初祖也。”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，第 290 页）

③ 童庆炳：《文学理论教程》，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第 2 版，第 170 页。



间，作为诗歌表现内容的社会生活自然发生了变化，作为诗歌创作媒介的语言（特别是语音）更是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中古音向近古音的演变，造成韵字在韵部中隶属关系的改变；而入声字的消亡，则直接影响律诗的平仄与对仗。但是，一个令人费解却毋庸置疑的事实是：辉煌璀灿的唐诗不仅成为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最高峰，成为后世或试图超越、或极力模仿的对象，而且唐诗所用的韵部，竟在语音业已发生剧变的千年后仍然规范着诗歌的创作。律诗的语音外壳并未随实际语音发生改变，而是顽强地、扭曲地停留在唐诗用韵阶段。在中国古典诗歌中，俨然存在着一个既独立于实际语音系统之外、又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唐人口语的特殊的语音系统，它被刻意强调着、传承着。

中国古典诗歌（尤其是律诗）体制与用韵的稳定性，吸引我追索隐藏在这一不寻常状态背后的原因，也直接促成了本论题的萌生。律诗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源自何处？律诗固步自封的约束力又来自何方？我发现，古典诗歌用韵不只是诗歌形式的问题，甚至不只是诗歌艺术的问题；诗韵牵涉到政治制度、文化选择、民族心理等方方面面，自唐代以来长期实行的诗赋取士制度是尤为重要的制约因素。

随着唐代诗赋取士制度的确立，诗赋被纳入人才选拔的程序，由抒情言志的艺术创作变成了科举入仕的敲门砖。出于技术方面的考虑，考试客观上要求诗赋必须是命题创作，必须符合一系列程式要求，同时，限韵作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举子们抄袭同题旧作。随着诗赋取士制度的发展完善以及考试竞争的日趋激烈，随着人们对试律诗认识上的僵化迷信以及写作技法的套路化，试律诗越来越丧失诗歌抒情言志的本质，过分追求对诗歌题目的完美阐释，要严格遵循起、承、转、合的布局谋篇原则，从而蜕变成五言六韵或八韵形式的“诗体八股”。同时，本来服务于创作的韵书被指定为押韵评判标准，并在时间推进、语音演变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僵化。相对于评价诗歌艺术水平的高低，考察诗歌对题目的摹写是否到位、是否出现声病杂犯、是否符合押韵要求，显然更具客观性与可操作性，更方便考官作出取舍。在应试诗的影响下，扣题合体、用韵工稳取代诗意创新，成为诗歌创作的重心；而诗赋取士命题时越来越严苛的用韵限制，使得韵字选择成为诗人创作思维的出发点，作诗变成了作韵。

在诗赋取士时代，家弦户诵使得诗歌成为一种广泛普及、倍受关注的技艺，数十万人以诗人的身份留下了自己的作品。但是，当我们翻开许多诗歌总



集、选集或别集，连篇累牍尽是贺喜祝寿、唱和应酬、游戏应景的陈腔滥调，其琐碎无聊的内容、模拟蹈袭的手法、狡狴卑琐的气度，直令人难以卒读。《清朝野史大观》卷八“清人逸事·满员笑柄”曾讽刺粗俗无文的满洲官员附庸风雅作诗的可笑：

吴县潘文勤公祖荫于前清光绪初叶长刑部。有满司员某，闻其好尚文雅，思所以媚之者，乃急就成诗数十首，恭楷录正，于堂上署诺时揖而进之。文勤即时翻阅，及首章题目乃《跟二太爷阿妈逛庙》八字，不禁狂笑，冠缨几绝。^①

此位满员为取媚上司，居然能够“急就成诗数十首”，创作速度之快、产量之高、胆子之大，真堪叹为观止。张伯驹先生在《春游纪梦》“试帖诗”条下引述这一几乎令人笑断帽带的俗鄙滑稽之事，并且说：

证于余所见者，此当为事实。余邑夏姓者为富户，亦附庸风雅，父子兄弟叔侄间皆为诗。叔某者号“项城才子”，余曾见其《辛亥革命感时》七律诗，内一联传为名句，云：“早知北地赞成少，孰意南方反对多。”侄某，七绝诗题为《闲游三叔厅院》，诗云：“闲游三叔大庭堂，一派清幽非寻常。两边排列太师椅，中间安放象牙床。”父某年事高，曾赶上科考时代，为诗皆旧题，其赋《鸣鸠在桑》五绝云：“老鸠立树枝，两翼勾尾鸣。忽然往下转，落在地流平。”又《赋得小楼一夜听春雨》（得春字）试帖诗，前四句云：“一夜昏昏睡，无精又少神。不闻雨打点，但听猫叫春。”余改编湖南戏《祭头巾》为京剧，以此四句为老举子自念其闹中所作得意之诗，颇为恰当。

清末，外邑文风窳陋，其已中举人者诗文殊不足观，其已中进士者甚至尚不知岳飞为何时人，因所存所读之书皆八股文与试帖诗，除此外更不知有学问之事，亦科考制度之流毒也。^②

① 李秉新等校勘：《清人野史大观》卷八，石家庄：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，第869页。按：“冠缨几绝”语出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：“淳于髡仰天大笑，冠缨索绝。”

② 张伯驹：《春游纪梦》，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，第48页。



张氏所见为清末民初“才子”赋诗、自鸣得意的鄙陋情状，科举流毒的浸染自然难辞其咎。当诗歌成为一件工具、写诗成为一种时尚，本无诗意之事、绝无诗意之人，套上“平平仄仄”、“平水”《佩文》的面具，居然也能混迹诗坛；本质上是滑稽取笑的“张打油”的拙劣翻版，竟然也敢一本正经地以“诗人”自居。难怪吴敬梓要在《儒林外史》中尽情嘲讽一群“斗方名士”^①，难怪袁子才要开出“少年科甲”、“先得出身，以捐弃其俗学”这样一剂偏激的拯救诗道的药方^②。

袁枚（1716~1797）与赵翼、蒋士铨合称“乾隆三大家”，是“性灵诗派”的主力。他于雍正五年（1727）考中秀才时只有12岁，“门前已送好音来，阶下还骑竹马戏”，甚至“倚宠仍眠大母怀”（袁枚《重赴泮宫》）；乾隆四年（1739）以二甲第五名进士及第时，也不过24岁。当时科场尚未加试五言八韵诗，此前曾让袁枚“四战秋闱，自不惬意”的是其“心之所轻”的“四书文”。后来他被举送参加乾隆元年（1736）博学鸿词科考试，落选后羁留京师，寄人篱下，“不得不降心俯首，惟时文之自攻”，仅用半年即成个中高手，连捷举人、进士，从此遂“与时文永诀”。^③可是能像袁枚那样以绝顶“聪明逐陈腐”（袁枚《途中寄金二质夫》），迅速跨越科举障碍、进入自由境界的人，能有几个呢？据张仲礼统计，清代童生考中生员平均年龄约为24岁，

① [清]吴敬梓：《儒林外史》第十八回“约诗会名士携匡二”：（匡超人）忙走下楼来，见是景兰江。手里拿着一个斗方卷着，见了作揖道：“候迟有罪。”匡超人把他让上楼去。他把斗方放开在桌上说道：“这就是前日宴集限‘楼’字韵的。同人已经写起斗方来。赵雪兄看见，因未得与，不胜怅怅，因照韵也做了一首。我们要让他写在前面，只得又各人写了一回。所以今日才得送来请教。”匡超人见题上写着“暮春旗亭小集，同限‘楼’字”。每人一首诗。后面排着四个名字是：“赵洁雪斋手稿”、“景本蕙兰江手稿”、“支谔剑峰手稿”、“浦玉方墨卿手稿”。看见纸张白亮，图书鲜红，真觉可爱。就拿来贴在楼上壁间。……次日出去访访，两人也不曾大受累，依旧把分韵的诗都做了来。匡超人也做了。及看那卫先生、随先生的诗，“且夫”、“尝谓”都写在内，其余也就是文章批语上采下来的几个字眼。拿自己的诗比比，也不见得不如他。众人把这诗写在一张纸上，共写了七八张。匡超人也贴在壁上。

② [清]袁枚：《随园诗话》卷七：“或言八股文体制出于唐人试帖，累人已甚。梅式庵曰：‘不然。天欲成就一文人、一儒者，都非偶然。试观古文人如欧、苏、韩、柳，儒者如周、程、张、朱，谁非少年科甲哉？盖使之先得出身，以捐弃其俗学，而后乃有全力以攻实学。试观诸公应试之文，都不甚佳，晚年得力于学之后，方始不凡。不然，彼方终日用心于五言八韵、对策三条，岂足以传世哉？就中晚登科第者只归熙甫（归有光）一人，然古文虽工，终不脱时文气息，而且终身不能为诗，亦累于俗学之一证。’”（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701册“集部·诗文评类”影印清乾隆十四年（1749）刻本，第349页）

③ [清]袁枚：《与浦之秀第二书》，《小仓山房文集》卷三十五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32册“集部·别集类”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清乾隆刻增修本，第426页。



举人约为30岁，进士约为35岁。^①“以最幸运的进士为例，如果他6岁开始读书识字，到36岁出仕，准备应考的时间是30年。”光绪二十年（1895）甲午科状元张謇（1853～1926）就曾花了35年读书应考，单是在考场里就待了160天。“至于那些绝大多数的落第者，他们应试时间之长，有时甚至无法估算，最长的有考到一百岁以上的记录。”^②而且按照规定，秀才必须年复一年地参加学政主持的岁考，达到一定水平，方能维持已经取得的身份。对于这些人来说，终其一生都不能脱离考试生涯，写八股文、作试帖诗，是他们读书应试、谋生处世所必需的内容。更可悲的是，很多人沉迷其中，不仅应付科场之诗之文充斥着八股习气，即便日常为诗为文，也难以摆脱应试套路，因为科场程式已经束缚了他们思维方式，内化到他们的心灵世界。像袁枚那样有能力挑战积习、有勇气弃捐官场、有天赋独树一帜的卓荦不羁的奇才，毕竟是凤毛麟角、难得一见的。

唐代之后的中国诗坛，官方力量以诗赋取士的形式介入诗歌创作，干扰了诗歌艺术自身的发展轨迹，更改变了诗歌创作者的思维方式。诗意随着原创性的衰退而淡化消失，诗艺则因试律诗的程式化要求而被过分强调凸显。传统的诗歌研究把重点放在历朝历代那些熠熠生辉的著名作家、芬芳美丽的经典作品上，本书则关注名家名作脱颖而出的平庸琐屑的大环境，把研究重点放在古典诗歌的生存环境与创作状态上。因为我始终觉得，最终决定诗歌发展方向乃至社会整体发展前景的，不是个别不世出的天才奇才，而是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心态。

全书分上、下两编。上编“诗赋取士制度考：唐代之后古典诗歌创作的重要背景”着眼于诗赋取士制度的复原，力求清晰呈现唐代之后诗歌发展的社会环境，剖析官方力量逐渐介入艺术创作的过程；下编“古典诗歌创作论：诗赋取士背景下的诗国风貌”则着眼于创作状态的描述，揭示在诗赋取士制度影响下诗歌传授、传承、传播的既非高雅也无诗意的现实，说明“言志”的诗歌如何蜕变为应试、应制、应酬的工具，剖析体现着强烈官方意志与功利色彩的考试“指挥棒”如何影响着文学的创作方式与文人的思想行为方式。两编均以古典诗歌研究为核心，互为表里，各有侧重。

① 张仲礼著，李荣昌译：《中国绅士——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，第103页。按：清代举子在履历中瞒报年龄的情况非常普遍，据以统计的文献资料如地方志、朱卷中的履历等，所记载的年龄一般都会比实际年龄小一两岁，甚至有相差十来岁者。

② 张杰：《清代科学家族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，第160页。



上 编

诗赋取士制度考

——唐代之后古典诗歌创作的重要社会背景

科举制度始于隋朝，确立于初唐，此后历朝沿用，除元代前期曾间断数十年外，直至清末废科举、兴新学，科举考试几乎不受战乱甚至改朝换代因素的影响，成为一种超政治的稳定制度。诗赋同为考试项目的朝代包括唐、五代、宋、辽、金；元代曾试古赋，不试诗歌；清代自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始，科场加试五言诗。唯明代专以八股时文取士，是唐代之后唯一一个正式科举考试中既不试诗、亦不试赋的朝代。

对于统治者来说，科举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；对于读书人来说，科举则为利禄之途，得之则荣，失之则辱，“天上人间一霎分，泥途翘首望青云”^①。在“学而优则仕”成为文人普遍的人生定位与价值取向的大环境中，科举考试作为一种具有坚实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制度，不可避免地对文人的生存与创作状态产生深刻影响。诗赋被纳入考试系统之后，诗人的身份、吟诗的契机都发生重大改变，抒情言志的艺术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蜕变成科举入仕的敲门砖，染上了浓重的功利色彩。诗赋取士制度演变的历史，亦可看作一部诗文由抒情言志通向功名利禄的发展史。对诗赋取士制度进行考察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代之后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重要社会背景，揭示影响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外部原因。

^① 江舍经：《历代小说笔记选·清》，上海：上海书店1983年，第957页。



第一章

诗赋取士制度的历史沿革

第一节 隋唐时期：从“以诗逞才”到“以诗选才”

唐代是科举制度正式确立的朝代，又是在政治、经济、民族意识、文化成就诸多方面对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与影响的朝代。长期以来，关于唐代科举制度的研究进行得颇为细致深入，所取得的成果相对来说更具重要性与影响力。唐代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诗歌极盛的朝代，不仅诗人数量众多、诗作质量极高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为后世树立了一个祈慕的典范。唐代诗歌繁荣与科举中强调诗赋取士之间的关系，向来是唐诗评论与研究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，历代学者论述颇多；唐代诗赋取士制度的渊源与影响，也是近年来很受关注的话题，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发掘、梳理与阐释工作目前已做得比较深入细致，结论性成果比较集中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余地相对有限。有鉴于此，本文将围绕“诗赋取士”这条主线，对前人研究相对薄弱的几个问题进行较为细化的分析。

一、隋代“选官试赋”：诗赋取士制度之滥觞

科举制度在隋炀帝时已经产生，这在学界已成定论；但是唐初贬低炀帝，相关资料散佚颇多，惟余“炀帝始建进士科”一语，见于杜佑《通典》^①。五代后晋刘昫所著《旧唐书》记载唐代宗宝应二年（763）礼部侍郎杨綰上疏条奏贡举之弊，有“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，当时犹试策而已”之语^②，提及炀帝

① [唐]杜佑：《通典》卷一四《选举二·历代制中》，清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浙江书局本，第20页a。

② 《旧唐书》卷一九《杨綰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75年，第3430页。



时进士科所试内容；北宋欧阳修等所修《新唐书·选举志》亦有类似记载^①，但当时进士科实施的具体情况基本已不可考。至于诗赋在隋朝是否曾经作为考试项目的问题，虽有“炀帝好文词，始置进士科，专诗赋取士，不复闾行能”的零星记载^②，但目前学界基本倾向否定性结论。

（一）州郡举士，惟务文词

从中国古代官员选拔体系的发展历史来看，隋朝处于从察举制与九品官人法向科举制过渡的时期。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，“罢中正之法，委铨举之司”^③，禁止州郡长官征辟属官，“大小之官，悉由吏部”^④，完成了举才选士权力的转移。而在人才考量方面，从汉魏至南朝，举才选士的标准逐渐由“以德取人”转向“以文取人”，尤其是经过南朝极度尚文风气百余年的浸润，“以文取人”的原则更被进一步强化，“世俗以此相高，朝廷据兹擢士。禄利之路既开，爱尚之情愈笃。于是闾里童昏，贵游总卯，未窥六甲，先制五言”^⑤。虽然隋文帝本人并不风雅，甚至有点儿敌视文学活动，但重文轻武毕竟是潮流所向。开皇九年（589）四月平陈后的诏书曰：

代路既夷，群方无事，武力之子，俱可学文，人间甲仗，悉皆除毁。
有功之臣，降情文艺；家门子侄，各守一经，令海内翕然，高山仰止。^⑥

这是隋代较早倡导文艺与儒学的官方文件。十八年（598）七月，又“诏京官五品已上、总管、刺史，以志行修谨、清平干济二科举人”。“志行修谨”重道德，“清平干济”重才干，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出现“州郡举士惟务文词”的局面。治书侍御史李谔上疏对“属文之家，体尚轻薄，递相师效，流宕忘反”的现象忧心忡忡，写《上隋高祖革文华书》，对之进行严厉抨击：

州县选举，不遵典则。作轻薄之篇章，结朋党而争誉；竞一韵之奇，

① 《新唐书·选举志》：“进士科起于隋大业中，是时犹试策。”北京：中华书局1975年，第1166页。

② [明]冯梦祯：《历代贡举志》，上海：商务印书馆1935~1937年丛书集成初编据学海类编本排印本，第2页。

③ 《旧唐书》卷一六六《元稹白居易列传》，第4359页。

④ [唐]杜佑：《通典》卷一四《选举二·历代制中》，第19页b。

⑤ 《隋书》卷六六《李谔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73年，第1544页。

⑥ 《隋书》卷二《高祖本纪下》，第33页。



争一字之巧。连篇累牍，不出月露之形；积案盈箱，唯是风云之状。^①

隋代选举的具体程序与方法已不可详考。诗赋在当时并未列为考试项目，并非由考官直接命题，对候选人进行统一考试，只是作为进行评价的参考标准，可以称之为一种通用方法，尚未固定为制度。对于士子来说，争巧竞奇、连篇累牍、邀名获誉等诸般作法，一般是在平时进行的，要依靠积累方能生效，而非在考场上临时完成。但这毕竟是诗赋比较经常地进入选官系统的开始。

（二）关于“开皇十五年选官试赋”

当代学者高光复提出“隋开皇十五年（595），选官开始试赋”^②的说法。他给出了明确的时间，却并未说明是以何种方式选官，也未提供相应文献记载。推考其说，当以《北史》所载杜正玄的经历为据：

隋开皇十五年，（正玄）举秀才，试策高第。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，怒曰：“周、孔更生，尚不得为秀才，刺史何忽妄举此人？可附下考。”乃以策抵地，不视。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，余常贡者随例铨注论，正玄独不得进止。曹司以选期将尽，重以启素。素志在试退正玄，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、王褒《圣主得贤臣颂》、班固《燕然山铭》、张载《剑阁铭》《白鹦鹉赋》，曰：“我不能为君住宿，可至未时令就。”正玄及时并了。素读数遍，大惊曰：“诚好秀才！”命曹司录奏。^③

此处涉及隋代科举中的秀才科。“秀才”一词始见于《管子·小匡篇》，意谓才之秀美者。在汉代察举诸科中，秀才科地位低于贤良方正，高于孝廉科；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代，秀才科成为贡举诸科之最，地位相当崇高，要求也极为苛刻，一般人不敢轻易问津，以至“隋代举秀才止十余人”^④，开皇十五年则只有杜正玄一人应秀才。他出色地通过了吏部曹司主持的方略策考试^⑤，无奈

① 《隋书》卷六六《李谔传》，第1544页。

② 高光复：《赋史述略》，长春：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165页。

③ 《北史》卷二六《杜正玄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74年，第961~962页。

④ 《旧唐书》卷七〇《杜正伦传》，第2541页。

⑤ 据《新唐书·选举志上》：“凡秀才，试方略策五道，以文理通粗为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、中上，凡四等，为及第”，而唐代“取士之科，多因隋旧”，则杜正玄所试亦应为方略策。